

#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 代表著作选

(二)

(供内部参考)

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室编

一九八〇年八月

# 目 录

## 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

|              |       |
|--------------|-------|
| 一 问题         | ( 1 ) |
| 二 民主和夺取政权    | ( 2 ) |
| 三 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成熟 | ( 8 ) |
| 四 民主的效果      | (16)  |
| 五 专政         | (28)  |
| 六 立宪会议和苏维埃   | (39)  |
| 七 苏维埃共和国     | (45)  |
| 八 实际事例的教育    | (57)  |
| 九 专政的遗留物     | (66)  |
| 甲 农业         | (66)  |
| 乙 工业         | (78)  |
| 十 新理论        | (87)  |

## 列甫·托洛茨基：《反对派政纲》

|                     |       |
|---------------------|-------|
| 第一章 前言              | (99)  |
| 第五章 苏维埃             | (109) |
| 第七章 党               | (114) |
| 第九章 我们的国际环境和战争危险    | (128) |
| 第十一章 关于真正的和伪造的分歧    | (142) |
| 第十二章 反对机会主义——维护党的团结 | (148) |

## 一 问 题

现在的俄国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使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成为一个巨大国家的统治者。这是一个远比一八七一年无产阶级取得对巴黎市的统治更为重大得多的事件。但是，在一个重要方面，巴黎公社却比苏维埃共和国优越。巴黎公社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事业。各个社会主义派别都参加了这个事业，没有一个派别置身于它之外或者被它排除在外。

相反的，今天统治着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却是在反对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斗争中取得政权的。这个政党是在把其他社会主义政党排除于统治机构之外的情况下行使其权力的。

两个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基于微小的个人猜忌，这种矛盾乃是以下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之间的矛盾：即民主的方法和专政的方法。两派抱着同样的目的：即通过社会主义来解放无产阶级，从而解放全人类。但是一派的道路却被另一派认为是会导致毁灭的错误道路。

对于像俄国无产阶级斗争这样的巨大事件，是不可能漠不关心的。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迫切地要表示态度，要热烈地表示态度。我们尤其感到迫切，因为我们的俄国同志今天所遇到的那些问题明天也可能对西欧具有实际意义，尤其是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决定性地影响着我们的宣传和策略的性质。

但是，我们党的责任在于：在我们透彻地审查过双方的论据之前，对于赞同俄国的兄弟内部争执的一方或他方姑且不作决定。

有些同志想要阻止我们这样做。他们宣称，未经审查就

表示赞同现在执政的这一派乃是我们的义务。任何其他态度仿佛都会危害革命和社会主义本身。而这无非是要把那种恰恰还有待于调查的事情当作已经证明了的事情来加以接受，也就是说，其中一派已经打开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必须鼓励它继续走这条道路。

当然，我们要求进行最自由的讨论，从而就已经站在民主的立场上了。专政则并不要求去驳到对方的观点，而是用强力来压制这种观点的发表。因此，在开始讨论之前，民主和专政这两种方法就已经不可调和地对立起来了。一个方法要求讨论，另一个方法禁止讨论。

然而，专政目前在我们党内还不居统治地位；我们这里仍然在进行自由讨论。我们认为自由发表我们的意见不仅是我们的权利，而且也是我们的义务，因为只有在听取所有的论点之后才可能作出切合实际和效果良好的决定。大家知道，片面之词不足凭信。必须公正地听取双方的意见。

因此，我们愿意在下面考察一下，民主对无产阶级来说具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作为一种政体，替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创造了怎样的条件。

## 二 民主和夺取政权

民主和社会主义（即生产资料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区别，有时是用这种式样来划分的：即有人把社会主义说成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运动的目标，而把民主说成仅仅是达到这这个目的的手段；这个手段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不中用的，甚至会起阻挠作用。

然而精确地说，社会主义本身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我们的最终目的在于消灭“任何种类的剥削和压迫，不管这种剥削和压迫是针对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性别，或是一个种族”。（《爱尔福特纲领》）

我们力求以支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实现这个目的，因为无产阶级作为最下层的阶级，不消灭产生剥削和压迫的一切根源就不可能解放自己；又因为在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层中，工业无产阶级是这样的一个阶层：它的力量、战斗力和斗争性都在不断增长，而且它将不可避免地要取得最后胜利。因此，今天每一个真正反对剥削和压迫的人，不管他出身于哪个阶级，都必须投身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

在这个斗争中，我们把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当作目的，因为在现有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看来是达到我们目的的唯一手段。假如有人能向我们证明我们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而且证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或者说才能最理想地实现（就像蒲鲁东所假定的那样），那末我们就势必要摈弃社会主义，但丝毫不放弃我们的最终目的，甚至恰恰是为了这个最终目的，我们才不得不摈弃社会主义。

因此，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一个是手段而另一个是目的。它们二者都是用来实现同一目的的手段。

两者的区别在其他方面。社会主义作为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没有民主是不可设想的。当然，即使在不是民主基础的其他基础上，也必须进行社会生产。在不发达的条件下，共产主义经济恰恰会成为专制主义的基础。恩格斯早在一八七五年谈到俄罗斯和印度一直到今天都保存着的那种村社共产主义时就认定了这一点。（《论俄国的社会关系》），一八

七五年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

荷兰殖民主义政策曾在一段时期内，在爪哇用所谓“垦植制度”的名义，在土地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替剥削人民的政府组织农业生产。

但是不民主地组织社会劳动的最显著的例子还是十八世纪巴拉圭的耶稣教团国家。耶稣教团教士们作为统治阶级，在那里利用专政的权力，以一种确实值得钦佩的方式组织了印第安土著居民的劳动；他们没有使用暴力而赢得了被他们统治的人的拥护。

但是对于现代的人来说，这样一种教权统治就是无法忍受的了。这种统治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存在：即统治者的知识水平比被统治者高得多，而被统治者完全不可能把自己提高到同样高的水平上。一个从事解放斗争的阶级或阶层不能把这样一种监护制度当成目标，而必须坚决拒绝这种制度。

因此，对我们来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把现代社会主义不仅理解为社会化地组织生产，而且理解为民主地组织社会。根据这个理解，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然而不能把这个命题干脆就颠倒过来。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确实是很可能的。甚至于纯粹民主在没有社会主义的情况下都是可以设想的，譬如，在小农的共同体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存在着对人人都完全平等的经济条件。

无论如何可以这样说：没有社会主义的和社会主义以前的民主都是可能的。那些认为民主同社会主义的关系好比手段同目的的关系的人，显然就是指这种社会主义以前的民

主；但同时他们往往急于要补充说，民主其实并非实现目的的手段。对这一结论必须极坚决地加以驳斥。这个结论如果被普遍接受的话，就会把我们的运动导向极不幸的道路上去。

为什么民主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来说是一种不中用的手段呢？

这里涉及的是夺取政权的问题。有人宣称，如果在一个迄今一直被资产阶级所统治的民主国家里，社会民主党有可能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那末统治阶级就会使用它所能调动的一切暴力手段来阻止民主的统治。因此无产阶级不能通过民主，而只能通过革命来夺取政权。

毫无疑问，当无产阶级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力量日益强大时，人们就必须估计到统治阶级会试图通过暴力手段来破坏新兴阶级利用民主。但是这一点却并不表明民主对无产阶级毫无价值。如果在上述的前提条件下统治阶级使用了暴力，那末它之所以这样做恰恰是因为它害怕民主的后果。而它的暴力行动无非就是推翻民主。

因此，意料中的统治阶级废除民主的企图，并不表明民主对无产阶级毫无价值，反而倒表明了无产阶级要千方百计保卫民主的必要性。当然，如果人们这样劝说无产阶级：民主根本就是一种无用的装饰，那末无产阶级就无从产生保卫民主所必需的力量。然而无论何地的无产阶级都如此地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以致不能指望他们会驯从地放弃这些权利。相反地，毋宁说可以预料，他们会如此强烈地保卫自己的权利，以致于当对方试图用暴力来摧毁人民权利时，他们对这种行动的坚决抵抗会变成一种政治颠覆。无产阶级对民主的评价愈高，愈热烈地珍惜民主，那末人们就愈能指望会

发生上述情况。

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应该认为这里所描述的事变进程无论在何处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倒还不必如此泄气。国家愈民主，那末国家政权的权力手段——连军事上的权力手段在内——就愈依赖人民的意志（民兵）。如果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还弱小，如像在农业国那样，或者由于无产阶级没有组织起来并且没有思想上的独立性，因而在政治上很软弱，那末，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上述的权力手段也可能变成暴力镇压无产阶级运动的一种手段。但是如果无产阶级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变得如此强大，以致它在人数和力量上都足以利用现有的自由来夺取政权的话，那末“资本主义的专政”想要调动必要的权力手段来用暴力废除民主将是十分困难的。

事实上，马克思曾认为英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用和平方法取得政权是可能的，甚至大概会有这种事的。一八七二年在海牙召开的国际<sup>①</sup>代表大会闭幕后，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演讲，除了谈到其他问题之外，他曾阐述道：

“工人总有一天必定会取得政权，以便建立新的劳动组织。工人必须打倒那些维持着旧制度的旧政策，如果他不像那些忽视和鄙视这类事情的旧基督徒那样放弃‘尘世的王国’的话。

“但是我们并没有断言，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无论在何处都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制度、风俗和

---

① 指第一国际。——译者注

习惯；而且我们并不否认，有这样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国家有更好了解的话，也许我还会加上荷兰，在这些国家里工人可以通过和平的道路达到他们的目的。然而并不是在所有的国家里情况都如此。”<sup>①</sup>

马克思的预测是否会实现，尚须等等再看。

在上述国家里，有产阶级中确实有某些阶层，它们想用暴力来对付无产阶级的倾向正在增长。但是另外也还有其他的阶层，它们对无产阶级日益增强的力量的尊重以及它们想要通过让步来讨好无产阶级的愿望也正在增长。尽管战争状态在其持续期间无论在何处都大大地束缚着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行动自由，然而战争状态却大大地扩大了英国无产阶级的选举权。目前还根本无法看出，在不同的国家里，民主将如何影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形式，以及民主在促使双方都避免使用暴力而只采用和平方法方面将起多大的作用。无论如何，民主的存在在这方面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在一个民主共和国里，人民的权利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已经在那里牢固地扎了根；这些权利是人民通过革命而赢得并且保持或扩大的，同时人民也教育统治阶级要尊重人民群众；在一个这样的共和国里，过渡的形式肯定将不同于那样的国家：其中军事专制统治迄今一直毫无限制地拥有镇压人民群众的最强大的权力手段，而且习惯于用这种手段来镇压人民群众。

然而在社会主义以前的时期内，民主对我们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民主对于过渡到无产阶级统治去的形式所发挥的影响。对我们来说，民主在这个时期内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民主

---

<sup>①</sup>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264页。——译者注

对无产阶级的成熟所发挥的影响。

### 三 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成熟

社会主义需要一种会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和必要的特殊历史条件。这可以说已被公认了。但是，为了使现代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究竟必须具备一些什么条件，也即一个国家到什么时候才成熟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间还根本沒有一致的看法。在一个如此重要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虽然如此，现在促使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的那种必要性，毕竟还含有一些可喜之处。因为这种必要性是由此而产生的：即对于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说来，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某种像在战争爆发时某些重新学习派人士向我们所保证的那样，要在几百年以后才会实现的事。社会主义已经作为实际问题而被提到当前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那末，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

人的任何有意识的行动都是以意志为前提条件的。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条件。这种意志是由大企业所造成的。在小企业在社会里占优势的情况下，人民群众是由企业所有主构成的。沒有财产的人为数很少。这些沒有财产的人，他们的理想就是要获得一小笔财产。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愿望会具有革命的形式，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革命不会是社会主义革命；这种社会革命只会把现有的财富按照人人都成为有产者的方式来重新分配。小企业经常产生着那种要保持或取得对那些用于劳动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意志，而不能产生那种要社会公有制、要社

会主义的意志。

这种意志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会在群众中出现：即大企业已经很发达，大企业对小企业的优越性已不成问题，解散大企业就会是一种倒退甚至是不可能的，大企业的工人只有采取一种社会化的形式才能取得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能维持存在的小企业都在日益衰落，以致于小企业主不再能依靠小企业来维持小康景况。这样，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才会增长起来。

与此同时，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可能性也随着大企业的兴起而增大起来。小企业的数目愈多，它们彼此之间的独立性也就愈大，要把它们以社会化的方式加以组织起来也就愈加困难。这种困难随着小企业数目的减少，随着它们之间关系的日益经常和固定而相应地减小。最后，随着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以及物质条件——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原料——的存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力量也就必然存在了。那些要社会主义的人必然会成为强有力的，必然会比那些不要社会主义的人更强有力。

这个因素也是由大企业的发展所造成的。大企业意味着无产者——也即实现社会主义符合其利益的那些人——的人数增多，同时也意味着资本家的人数减少。这种减少是在与无产者人数相比之下的相对减少。若与非无产阶级的中间阶层，也即与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相比，资本家的人数在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增多。但是，无产阶级在全国是壮大得最快的。

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从经济发展中直接产生的。这些因素并不是在没有人作用的情况下自己产生的，但是它们是在没有无产阶级的作用的情况下，单单靠资本家的作用而自己

产生的；资本家对于大企业的成长感兴趣。这种发展主要是城市的和工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只是这种发展的一种微弱的余波。社会主义是从城市和工业里产生的，不是从农业里产生的。但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还需要有一个第四因素：无产阶级不仅必须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兴趣，不仅要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拥有利用这些条件的力量，而且还必须具备一种保持和正确运用这些条件的能力。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作为持久的生产方式而付诸实现。

因此，要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除了条件的成熟和工业发展的必要水平之外，还必须加上无产阶级的成熟。但是这个因素不是光靠工业发展，光靠资本家牟取利润的努力的作用，而不要无产阶级本身的作用就能产生的。这个因素必须从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努力中产生。

在小企业居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没有财产的人分成两个阶层。一个阶层是手工业工人和学徒以及较年轻的农民子弟，他们的无财产状态只是一种过渡阶段。他们指望有朝一日会成为财产所有者，并且对私有财产有兴趣。没有财产的人中间还有一种人是流氓无产者，这是一个对于社会说来是多余的甚至是增添麻烦的寄生虫阶层，他们没有教育，没有觉悟，也不团结。遇有可能的机会，他们也很愿意去剥夺有产者，但是他们既不愿意、也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了这个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人群在资本主义的初期是为数众多而到处充斥的。资本主义把这些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寄生虫转变成生产上的、从而也是社会上的必不可缺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增多着他们的

人数，从而扩大着他们的力量，但是资本主义使他们仍然停留于无知、粗鲁、无能的状态。资本主义甚至力求把整个工人阶级压低到流氓无产者的水平。由于劳动过度、劳动的单调乏味以及女工童工的劳动，资本主义甚至往往把工人阶级压低到还在从前流氓无产阶级的精神水平以下。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就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

于是，从贫困化中就产生了要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动力：即力争终止那日益增长着的群众贫困化。但是这种贫困看起来仿佛会使无产阶级永远没有能力来解放自己。仿佛应该靠资产阶级的怜悯来拯救他们，并且给他们带来社会主义。

人们很快就看出，不可能从这种怜悯中指望得到任何东西。实现社会主义的足够力量，人们只能指望从那些其利益就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人，也即从无产者那里获得。但是他们难道没有灰心得绝望了吗？然而，无产者毕竟没有全都灰心绝望。还有某些阶层依然保持着向贫困作斗争的力量和勇气。这一小部分人似乎还能做那些空想家所不能做的事，似乎能用一次突然的袭击来取得国家政权，并从而给无产阶级带来社会主义。这就是布朗基和魏特林的看法。无产阶级过于愚昧无知和心灰意冷，以致不能组织和管理自己，仿佛应该由其中出类拔萃的人物组成的政府自上而下地来组织和管理他们，正如耶苏教团当年在巴拉圭组织和管理印第安人那样。

魏特林预料会有一种个人专政，这个人能率领一支胜利的革命队伍来实现社会主义。他把这个人称为救世主。

“我看出了一个佩带宝剑的救世主的来临，他是为实现先知的教义而来的。

“由于他的勇敢，他能成为革命队伍的领袖，并且借助于这支队伍，他将粉碎旧社会制度的腐朽机构，而使眼泪之泉流入遗忘之海，并使人世变成天堂。”（见《和谐和自由的保证》一书，一八四九年第三版，第312页）

好一个伟大崇高和振奋人心的预见。然而，这种预见仅仅建立在一支革命队伍将找到它理想的领导人这一信念的基础之上。但是，如果人们不相信会有这样一个救世主，如果人们深信无产阶级只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而且深信只要无产阶级在其所夺得的各种组织中、因而也在国家中还没有具备自治的能力，社会主义就注定只能是一个空想的话，那末，由于资本主义已经使工人阶级贫困化，社会主义岂不已被宣布为毫无希望了吗？这看来好像如此。然而，实践和理论立即指出了一条出路。在英国，工业无产阶级首先开始了一个群众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获得了一些初步的民主权利，获得了进行组织和宣传的一些可能性，而且，资产阶级在同贵族进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甚至呼吁他们起来采取行动。

最初的工人运动以及无产阶级反对贫困化和无权状态的斗争，都首先发源于工会和宪章运动者；无产阶级的罢工以及要求选举权和正常劳动日的巨大斗争也是在工会和宪章运动者中间开始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看出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贫困化学说”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特点。在这一点上，他们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者的看法是共同的。但是他们比其他社会主义者高明，因为他们不仅仅看出了资本主义的贫困化趋势，而且还看出了无产阶级的反贫困化趋势，并且他们在这种反贫困化趋势中，也即在阶级斗争中，看出了重大的因素，这个因素会提高无产阶级，并且使无产阶级具备这样

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如果无产阶级不仅是要利用机会、作为偶然的成功而夺得政权，而且还要能够保持和运用这个政权的话。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作为一种群众斗争，是以民主为前提的。即使这种民主并不就是“绝对民主”和“纯粹民主”，它也应该是为组织和经常教育群众所必需的那种程度上的民主。而组织和经常教育群众，用秘密方法是根本不够的。少数的传单不能代替广泛发行的日报。群众不能用秘密方式来加以组织，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秘密的组织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组织。秘密组织总会导向个人独裁，或一小撮领导人的独裁。普通的成员在这里只能是执行命令的工具。在被压迫阶层完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这种状态就成了必要的，但是它不能促进群众的自治和独立性，倒很可能会加强领导人的以救世主自居的感觉和他们实行独裁的习惯。

就是这位竭力颂扬救世主作用的魏特林，曾极其轻蔑地谈论民主。

“共产主义者们在政府形式的选择问题上意见依然还相当不一致。法国很大一部分共产主义者倾向于专政，因为他们十分明白，共和主义者或者更正确地说政治家们所理解的那种人民统治，对于从旧组织到完美的新组织之间的过渡时期来说是不适宜的。尽管如此，卡贝<sup>①</sup>还是从共和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人民统治的原则，但是他懂得很巧妙地使这个原则在过渡时期内加上一种几乎不被察觉的专政。而英国共产主义者领袖欧文，则终于认为每人都应该按其年纪大小而执行一定的职务，因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就同时也就是政府中最年

---

① 1788—1856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译者注

长的人。除了傅立叶派认为任何政府形式都一样以外，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一致认为，那种被人称为人民统治的政府形式，对于这个刚刚兴起的还有待实现的共同体原则来说是一种极不适用的、甚至是危险的支柱。”（见《保证》一书，第147页）

魏特林更进了一步。他认为，即使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不需要民主。

“如果人民统治这个概念是合适的，那末所有的人都必须实行统治。但这是永远也不会有事情。所以，它还不是人民的统治，而是人民中的一些人的偶然的统治。”（见第148页）

魏特林想要由最伟大的天才来统治。这种天才应该在科学会议上用解答有奖难题的方式评选出来。我之所以更详细地援引魏特林的话，是为了表明这种被当作最新的智慧介绍给我们的对民主的轻蔑，是一种很陈旧的看法，它是从工人运动的十分原始的状态中产生的。在魏特林轻蔑地嘲笑普选制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同时，英国的工人却在争取这些权利，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站在工人这一边的。

从那时候起，整个欧洲的工人阶级在无数次——常常是流血的——斗争中，接连争得了一项又一项的民主权利。而且由于他们为了赢得、保持和扩大民主而进行斗争并且不断运用各种民主权利来进行组织、宣传和争取社会改革，无产阶级就一年一年地愈加完熟起来，无产阶级已经从人民群众中最低的阶层变成了人民群众中最高的阶层。

无产阶级因而就已经达到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成熟程度了吗？社会主义的其他条件也已经具备了吗？这个问题今天是颇有争论的，有一些人的答案是坚决肯定的，而另一些人的

答案则是坚决否定的。在我看来，这两种答案未免都过于轻率。实现社会主义的成熟性，不是一种在我们还不能用实例来进行实际论证之前就可以靠统计数字来确定和计算的情况。无论如何，像时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在讨论这种问题时过分地强调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是错误的。毫无疑问，没有大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硬说只有在资本主义不再能向前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那就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为什么必须如此。但这样说却是正确的：即大企业愈是发达，也就是说，需要社会化地加以组织的企业的数目愈少，社会主义就愈加易于实现。然而这一点只有在从一个特定国家的观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时才能加以适用。可是在这个范围内把问题简单化，是会被下列事实所驳倒的：即随着大企业的成长，同时也会引起市场的扩大、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流的发展、从而也就引起对生产加以社会化组织的问题的不断扩大化和复杂化。而且，我们没有理由来断定：在现代工业国家里，由于有其银行制度和企业主组织，现在已经有可能由国家、地方自治团体和合作团体来把绝大部分的生产为了社会的目的而组织起来。

决定性的因素已经不再是物质的因素，而是人的因素：即无产阶级是否足够强大和是否具备足够的知识，足以由自己来掌握对社会的管理？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是否具备那种能使政治民主扩展到经济领域、实现经济民主的力量和能力？这还不能作肯定的预言；这里所涉及的因素是一种在各个国家里发展得悬殊很大的因素，这个因素在同一国家里在不同的时期也有很大的变化。因为，足够的力量和能力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同等程度的力量今天在敌人强大的情况下